

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驱动研究

——基于云南直过民族整族脱贫实践

尤伟琼 曾宇龙¹

【摘要】：“直过民族”是中国特有的概念，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它逐渐成为历史名词。在云南 11 个直过民族整族脱贫的历程中，政策性的外源驱动和族群内的内生动力所形成的合力是引领这些族群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也将在乡村振兴中以惯习的方式和力量继续推动各民族走向富裕。

【关键词】：直过民族 人口较少民族 发展驱动 整族脱贫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0）06—0117—08

工业化以来，人类对自身的发展充满无限遐想，展望的基础是探索人类的过去。人类社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终极疑问。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的“五阶段论”亦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中国是拥有 56 个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按照马克思的人类发展五阶段论，众多民族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央政府把一些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发展阶段、人口数量较少的民族认定为直过民族，期望通过党和政府实施特殊的经济、社会、干部等扶持政策，使其一步跨越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等社会发展形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国家扶持和自身努力下，直过民族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快速发展，正在逐步实现与其他民族的均衡发展。时过境迁，直过民族已经渐渐成为一个历史概念，这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已经融入现代化生活。本文将通过分析云南 11 个直过民族整族脱贫实践，探究中国的直过民族是如何实现族群整体发展，其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

一、直过民族概念形成的历史与理论渊源

中国有多少个民族？这个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没有确切的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改变过去民族成分和族称混乱的状况，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国从 1950 年启动了民族识别工作。民族识别的首要任务是明确界定民族概念。民族的概念和界定问题在中国的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在民族识别工作之时借鉴了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共同体”^①。但斯大林的定义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在中国民族识别的具体工作中，并没有简单地照搬这一定义，而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科学结合，采取“名从主人”的民族平等政策原则，成功解决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构成问题，让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人口多少不一的各民族在国家法律层面实现了政治上的一律平等。

自 1950 年起，党和国家组织大批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全国上报的 400 多个民族名称进行了科学的辨识，到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共确认了 56 个民族成分。中国的民族识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工作，在世界上是一个创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是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¹**作者简介**：尤伟琼，女，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曾宇龙，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边境少数民族抵边居住生产生活困境及对策研究”（项目号：18BMZ079）的阶段性成果

（一）直过民族概念形成的理论渊源和概况

直过民族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 20 世纪 50 年代，对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是奴隶社会形态的少数民族不进行民主改革，通过国家和政府的帮助，使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形态。他们所居住的区域被相应划定为“民族直过区”，简称“直过区”。直过民族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以云南省最多，包括独龙、基诺、怒、佤、德昂、布朗、景颇、傈僳和部分拉祜、哈尼、瑶等民族。除云南省外，还有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西藏自治区的珞巴族，海南省的部分黎族，以及一些尚未被识别归并的民族群体也属于这个范畴。

云南的直过民族特点相对更为明显，他们大部分居住在边境沿线，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居住地域山高谷深、交通不便、社会发展迟滞性和隔离性突出、生产生活粗放、主动融入社会发展主流意愿低等特点，主要分布于保山、丽江、普洱、临沧、红河、西双版纳、德宏、怒江、迪庆的 58 个县(区)的 271 个乡镇 1179 个行政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直过民族的社会发展形态基本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私有制转化的低级阶段，盛行土地和生产资料为氏族公有，沿袭游牧、刀耕火种、广种薄收、采集狩猎、刻木记事的生产生活方式，采用原始平均分配原则，具有社会发育程度低、生产水平低下、阶级分化不明显、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宗教文化等特点。此外，“直过区”还存在着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压迫、民族纠纷等矛盾，国民党残余和境外敌对势力也不断利用民族矛盾和宗教问题挑起事端，引起了一些极端性事件，从而构成了边疆直过民族社会形态变革的起点。

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用正确的方针政策就能够帮助和支持处于不同发展程度的欠发展少数民族，甚至是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人口较少民族在较短的时间内越过多层次发展形态，建立起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政权，以及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直过民族的飞跃不仅是政治制度上变革，还包括生产关系的转变。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社会生产的两个方面，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生产力是最终力量。直过民族要实现生产力的发展飞跃，比起生产关系的跨越则更加艰巨，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努力。

（二）云南直过民族脱贫发展的实践历程

云南直过民族实现与其他民族一道迈进“小康社会”经历了直接过渡、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个阶段的跨越历程，也是 11 个直过民族从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到实现全面发展的整族脱贫发展历程。从而，“直过民族”这一阶段性称谓也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退出历史的舞台。

1. 第一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生产关系的跨越

“直接过渡”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实际以及边疆民族历史相结合的产物。1953 年初，中共保山地委对以潞西三台山为中心的山区，开展了对包括德昂族、傈僳族在内的景颇族聚居区的社会调查，首次提出应以团结、生产为指针发展生产力，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意见^①；7 月，云南省“边委”派民族学家马曜等人两次到潞西遮放西山景颇族聚居区，根据实地调查情况提出对此类地区不进行土地改革，采取多种适应民族发展实际的特殊政策和多样灵活的方式，促进本民族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②1954 年，云南省向中央汇报民族地区“直过区”方案，得到充分肯定；同年 9 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社会发展进程缓慢的民族地区采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意见。毛泽东、刘少奇对此进行了批示，正式确立了“直接过渡”“慎重稳进”的方针。^③各级政府根据中央精神要求，针对“直过区”内各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采取了系列特殊政策来帮助其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跨越。

政治政策方面。采用较为和缓的方式进行社会形态改变，以团结、生产、进步为工作中心，不分土地、不划阶级、不搞土改，废除土司对直过民族的统治和压迫，土地转化为集体所有，确立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消除民族隔阂，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实现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跨越。

经济政策方面。制定特殊优惠政策，减少经济结构性差异，对直过民族的生产生活提供无偿补助和全力扶持。制定了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减免农业税、屠宰税和营业税，对供应“直过区”的部分商品实施价格补贴，鼓励把货物运到边疆销售。在生产互助合作过程中，由国家对农户无力负担农业生产资料 and 资金的情况，给予扶持帮助或贷款解决。

社会政策方面。传播先进农业生产技术，鼓励群众接受国民教育，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减少云南直过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差异。通过设立教育专项补助经费，实施基础教育制度，建立初高中助学制度、创办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加大大中专学生培养力度，促进了“直过区”各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如景颇族和佤族在 1956 年组织 1% 的 14—50 岁的文盲入学，至 1961 年实现全部组织入学。⁽²⁾在“直过区”开始建立少数民族医疗服务体系，发展少数民族医疗事业，拨发医疗专款补助，援助大批医疗设备和药品并实行免费医疗，同时派出医务人员为各族群众巡回诊疗。

人才政策方面。云南出台了《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规划意见》，文件明确规定，各级政府要充分吸收人口较少民族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各县处级领导班子中，必须配备 1—2 名由劳动人民出身的民族干部，在地区一级的领导班子中应有 2—3 名民族干部。文件的出台和实施培养了一批忠诚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决跟党走的各民族优秀干部人才。

通过以上结合直过民族实际的特殊措施的实施，不仅调整了直过民族本身的生产关系，还调整了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社会关系，民族之间的分层结构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普遍存在的政治差异得到解决，经济差异和文化差异逐步缩小，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社会形态跨越式发展。

但“直接过渡”政策在创新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时代局限性。群众的发展是不能命令的，这种发展受到群众生活条件的制约，因而必须是逐步前进的。⁽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过度地强调发展集体经济，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违反了“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变革”的唯物主义原则，对发展家庭经济的打压和制止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使直过民族在社会发展上走了一些弯路。直过民族群众依旧存在的陈旧思想观念、自我封闭意识、原始平均主义、严重依赖思想，使其自我发展能力较弱，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在生产生活上更多地依靠党和政府扶持帮助的现象。

因此，直过民族在第一个阶段跨越发展实现了生产关系变革，完成了社会形态转变。但这一阶段的跨越并未能实现与生产关系相对应的生产力的同步跨越，导致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进程中，直过民族与其他民族发展逐渐拉大了差距，并出现一些社会矛盾。

2. 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后的生产力跨越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⁴⁾上一阶段生产关系的转变已为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过民族逐步摆脱了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打破了原始平均分配思想和自然经济发展壁垒，开始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有机统一，在总体上适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

随着发展的深入，市场经济自主、竞争、开放、效率、平等的原则与直过民族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集体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不相适应，直过民族温饱第一的生活观、重农抑商的生产观、原始共有的分配观受到了强烈冲击，表现出对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大生产的无所适从，加大了直过民族与内地和其他民族之间的差异化和边缘化水平。经济上，原有的生产方式被取代，其计划性差、生产经营能力弱等问题越来越凸显，直过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整体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性更加突出。文化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冲击了包括直过民族在内的民族传统心理和传统文化习俗，直过民族的自我认知、价值判断以及心理上发生变化，带来了认同危机。加之改革开放后，直过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在发展扶持政策上被逐渐忽略和弱化，直过区与其他地区、直过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发展差距进一步加大。

进入 21 世纪,经过 10 余年的扶贫开发,云南直过区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涌现出一批发展典型,如西双版纳的景洪基诺族、勐海布朗族、德宏潞西三台山德昂族、怒江贡山独龙族、红河金平者米拉祜族的“两乡三山”典型。一些直过民族充分发挥沿边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如布朗族的茶产业、基诺族的旅游业,综合经济实力得到了提升。但是,这一时期国家对直过民族的帮扶政策带有全域性的普遍扶贫性质,缺少 20 世纪 50 年代充分考虑和照顾直过民族特点的针对性。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直过民族中起主导作用的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也日益突出,导致直过民族的第二次跨越发展进入瓶颈期,仍然未能和其他民族实现同步发展。

3. 第三个阶段:十八大后的全面发展

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有机统一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大发展的关键。对于“直过民族”而言,如何从刀耕火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并融入市场经济大潮之中,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一条艰难的必经之路。

直过民族大都聚居在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其发展状况受到区域内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进入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精准扶贫等给直过民族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制定了发展战略,如一族一策、一族多策、整族帮扶、整村推进、整乡扶持、易地搬迁、人口较少民族扶持、兴边富民、特色村寨、山区综合开发等,为促进直过民族发展不断添砖加瓦。

在党和国家专项政策的大力扶持与各民族自身不懈努力的共同作用之下,直过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观,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逐步有机统一,实现了直过民族社会生产方式的全面跨越。2020 年 3 月云南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2015 年至 2020 年 3 月,在现行标准下的云南农村贫困人口累计脱贫 613.8 万人,年均减贫 120 万人以上,贫困发生率从 2015 年的 17.09%下降到 2019 年底的 1.32%。独龙、基诺、德昂、阿昌、布朗、普米、景颇、佤、拉祜等 9 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族脱贫^①。2020 年 11 月,云南省扶贫办宣布怒族、傈僳族实现整族脱贫。至此,云南 11 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实现“一跃跨千年”的美好愿景。

二、外源驱动与内生动力:云南直过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内涵

直过民族的发展,一直以国家和政府这些外源驱动力量支持和帮助为主。党和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通过政策制定管理措施,给予多源资金投入、对实施效果进行检查和评估,在扶贫发展上形成整体联动机制。内生动力是指包括个人、家庭、族群、社区为了实现增产增收,主动学习生产技能,积极参与农业技术推广实施与反馈的过程中促进特色产业发展。正是在国家高位推动和强大支持的引导下,对各区域中的直过民族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体制与机制的调整调适,激发了民族群体在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最终是政府和民族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实现了直过民族的整体性脱贫,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 外源驱动:“直过民族”整族脱贫的关键和核心

与其他民族相比,“直过民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最贫困、最特殊、最弱势的群体。云南的“直过民族”集边疆、山区、人口较少、直过、欠发达等特征于一体,自然条件与基础设施、产业、教育、经济发展等面临的现实困境共同导致了“直过民族”贫困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时,“直过区”多在边境地区,多个民族沿边居住,与毗邻国家边境民族大都有着亲缘姻缘关系,政治敏感度和影响性都极高。因此,各级党委、政府采取的特殊扶持政策事关边疆民族团结、中华民族认同、边境稳定安全的重要大事,对进一步加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直过民族”连片贫困和深度贫困的实际情况,党中央实施高位推动、顶层设计,地方政府采取一族一策、一族一帮等措施;整合社会力量,实施一个集团帮扶一个民族聚居区的攻坚模式,八方聚力促发展。通过外源强有力的驱动,推动“直

过民族”实现社会形态和物质形态两个“千年跨越”，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少数民族贫困问题、实现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正确道路，体现了各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1. 国家层面统筹驱动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党和政府就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先后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中国农村扶贫开发”（2001—2010、2011—2020）等一系列举措。经过 30 余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已有 6 亿多人脱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直过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整族脱贫奔小康问题高度重视，进行了多次实地调研，在制度设计、政策供给、项目资金上给予大力倾斜，倾力帮扶。2016 年 1 月，汪洋同志在云南专题调研后提出：“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采取超常规举措，不断加大支持力度，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坚决打赢‘直过民族’脱贫攻坚战。”^①2020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又着重强调：“云南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脱贫攻坚任务重，特别是一些‘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体脱贫更是难中之难，艰中之艰。”^②水利部、国家林草局、交通运输部等国家部委针对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通村道路硬化等给予了倾斜支持。党和国家对“直过民族”整族脱贫的高度重视，鲜明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的民本情怀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是云南“直过民族”人民战胜贫困、迈向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

2. 地方层面强力驱动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云南党委和政府把在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加大倾斜支持力度，把 11 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脱贫攻坚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中之重，精准把脉，把谋全局方向与谋一域之力有机结合起来，凝心聚力创新施策，构建了专项、行业、社会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组织实施了“兴边富民”“‘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脱贫攻坚”“沿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三年行动计划”，探索出“一个民族一个行动计划”的精准扶贫路子。

云南在“直过民族”整族脱贫实践中最大的特色亮点在于打破以往省州部署、县乡落实的扶贫模式和“本级为主、下抓一级”的工作常规，直接高位推动，省州县乡村五级联动，形成多点多位支撑的脱贫攻坚行动领导和工作机制。各层级政府明确职责划分，由省级层面承担项目规划、资金筹措等主体责任，县、乡两级政府负责具体的组织实施。五级联动机制和以建制乡和民族整体综合扶贫模式的开启，保障了“直过民族”整乡推进、整族帮扶工作的顺利开展。

3. 社会力量多元驱动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体现在聚焦重大关切、集中力量办大事上。社会多元力量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使“直过民族”整族脱贫成效更加显现。在教育部的组织下，全国 40 余所高校、10 余个职教集团为各民族开展了师资培训、学科建设、产教实训基地建设等对口帮扶，极大助力了直过区民族的智力扶贫发展进程。在“一个民族一个集团帮扶”的创新模式下，三峡集团、华能集团、大唐集团、中烟云南工业公司等企业集团针对云南的 19 个贫困县以及 2 个非贫困县的景颇、阿昌、布朗、佤、普米、拉祜、怒、傈僳等 8 个民族及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内的 43 万贫困人口，采取硬件建设与软件加强、短期帮扶与长期帮扶、脱贫帮扶与提智帮扶相结合的方式积极承担政治和社会责任。社会力量的积极有序地加入，为云南省“直过民族”整族脱贫增添了新鲜且强大的新助力。截至 2019 年底，15 个县的 69.92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

（二）内生动力驱动：“直过民族”整族脱贫的根本和基础

“直过民族”多数居住在高山深谷，长期处在封闭状态，社会发育程度低，生产生活方式粗放，市场意识、积累意识、扩大再生产意识淡薄，内生动力不足，发展能力弱，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致贫返贫风险大。因此，要在直过区最终实现脱贫攻坚行动的最终胜利，不仅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必须完成从物质扶贫向物质、精神扶贫齐步走的扶贫方式的转变，

以及从保障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扶贫目标的转变，改变“直过民族”安贫乐道、故步自封的现状，引导其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观念，摆脱思想贫困和精神贫困，不断增强群众的内生动力，以实现知贫、脱贫、防返贫，志富、智富、再致富的发展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族群内部的社会结构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族群精英和民众的分化决定了其所承担的功能不同，并由此发挥着不同的内生动力驱动作用。

1. 民族精英：直过民族整族脱贫的“希望火种”

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直过民族”族群内部的精英不断涌现，如独龙族的高德荣。这些精英往往都是族群内部中有声望、有能力的贤人和能人，发挥着领导、指挥族群发展，协调内部人员关系、解决邻里关系冲突等作用，是带头富、带民富的“双带”型人才。同时，这些族群精英绝大多数在村支部、村委会中担任职务，通过宣传党的政策，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带领广大基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家致富奔小康。在脱贫攻坚行动中他们发挥专长，树立榜样，以身作则形成标杆效应，他们是直过民族整族脱贫的希望火种，点燃直过民族整族发展的热情、带来直过民族整族脱贫的希望、照亮直过民族整族美好的未来。

2. 一线党员：直过民族整族脱贫的“复苏之风”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①。在直过民族的脱贫攻坚实践中，数以万计的驻村第一书记、驻村扶贫队员、村干部以及本族群中党员干部在一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光发热。他们发挥一线党员干部政治素质好、工作作风实、综合能力强的优势，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排头兵”，积极牵线搭桥，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想方设法为群众解难事、破困境；他们深入农户和贫困户家中调查走访、召开群众会、发放宣传材料等，向人民群众宣讲各项惠民政策，将扶贫思路、工作措施、贫困村和贫困户退出标准、农村危房改造、健康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等政策宣传到每家每户每人之中，提高了群众的政策知晓率和满意度；他们做好贫困群众思想工作，提高扶贫对象的自立自强意识，激发摆脱贫困内生动力，调动村民脱贫干劲，消除“等、靠、要”思想，让其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庭经济情况，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一线党员干部是直过民族整族脱贫的“复苏之风”，为直过民族的整族脱贫送来了党的方针政策和关心，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理念，唤醒了民众的发展意愿和动力。

3. 民族群众：直过民族整族脱贫的“燎原之火”

“直过民族”从整族极度贫困到整族一起脱贫的发展跨越，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重要转变，更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战役中，仅凭族群精英的“希望火种”和一线党员的“复苏之风”还不足以跨越历史问题、地理偏远、思想陈旧、技能落后等“阻燃物”，缺少直过民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再炽热的“希望火种”也会黯然熄灭，再强劲的“复苏之风”也将无可奈何。因此，只有激发直过民族群众奋勇向前的斗志，直过民族整族才能在“希望火种”的引领下、“复苏之风”的吹拂中燃起喷薄发展的“燎原之火”，直过民族地区才能一改陈旧落后的旧貌、换上蓬勃生机的新颜、点亮灿烂似火的未来。

一是从“要我富”到“我要富”的思想转变。直过民族中的贫困群众不仅仅是脱贫攻坚的直接对象，更是各个族群实现整体发展的中坚力量，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①摆脱贫困首要的是摆脱意识和观念的贫困，而不仅仅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贫穷并不可怕，怕的是身处贫困而浑然不觉，怕的是已然贫困而不思进取。在过去的扶贫工作和扶贫项目中，政府和相关部门对于直过民族的发展包办代替过多，群众的参与性不高、参与度不足，老百姓中流传的“扶贫干部下地忙，群众坐在墙根晒太阳”就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

从思想上精神上拔除“穷根”，从意志上品格上立起“脊梁”，树立起劳动光荣、脱贫光荣、致富光荣的价值取向，激发直过民族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在整族脱贫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自强、诚信、感恩”主题实践活动把中央的关心关怀宣传到村村寨寨、家家户户，使广大“直过民族”群众知晓党和国家的政策、明确发展目标、开阔思维和眼界、激发出贫困群众个体

和家族想脱贫、争脱贫、比脱贫的热情和信心。乡风文明建设积极引导“直过民族”群众自觉抵制陈规陋习，消除过往“等靠要”思想，自力更生、奋发有为的思想观念有力地改变贫穷落后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劳务输出让民族群众开阔了眼界，增加了家庭收入，以工代赈、生产奖补让每家每户参与到扶贫项目的各个环节。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布朗山乡曼班三队，布朗族群众按照发展生产增收与提高人口综合素质相结合的原则，创建相互带动、相互帮助、相互督促的合作化模式，白天村民种植水稻、茶叶、药材，晚上参加扫盲夜校学习汉语，这个过去“说着不听、拉着不动、赶着不走”的特困村寨发生了巨大变化，村民从“不出门、不愿见外人”到现在“约着拉着要外出”，全村 17 户 58 人全部实现脱贫，走上了致富道路。独龙族群众分析自身情况，根据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走上了种养草果、独龙牛等产业发展的致富路。他们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让自己过上了幸福生活，真正让他们摘掉贫困帽子的原因，不是“等靠要”是“勤劳”，不是“要我富”是“我要富”，不是自我放逐是自强不息。因此，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②

二是不仅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的追求升华。^③云南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度低，这不仅制约着人们的认知水平、生产能力，而且阻碍着思想观念上与时俱进融入社会发展主流，阻挡着充分利用现代社会技术条件反哺民族自我发展进步的步伐。2016 年起，云南省逐步在“直过民族”聚居区实施 14 年免费教育、行政区幼儿园全覆盖等一系列推动各级各类民族教育发展的政策。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直过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环境，电子商务为基诺山寨的生活带来便利，网络科技为德昂山寨送去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就业扶贫促进了贫困群众对外交流，转变了村民观念，提升了其素质能力。在 2016—2019 年云南各地开展就业培训 18.43 万人次，转移就业 12.41 万人，一批批适应当地产业发展需要的劳动者队伍在“直过民族”中发展起来。文化和技能培训的渠道多源、层次分明、形式多样促进了直过民族群众逐步转型为有文化、有素质、有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伴随“直过民族”群众自我发展主体意识和发展能力的提高，其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也大幅增加，为“直过民族”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打下了坚实的心理基础。

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市场经济的“魔力”和互联网的普及，缩小了“直过民族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与鸿沟，古老的民族更加开放、更加自信。过去连汉语都不会讲的少数民族村民，现在能用普通话跟人交流，谈起生意来更是头头是道；村民们保护生态的意识越来越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不少村寨变成了现实。

外源强力驱动，内生不懈动力，数年奋斗，终有所成。2020 年 3 月，云南的独龙、德昂、基诺、佤、普米、阿昌、拉祜、布朗、景颇等 9 个民族实现整族脱贫；11 月，傈僳族、怒族实现整族脱贫。从此，云南的 11 个“直过民族”实现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走上了新时代的发展道路。

三、结语

（一）“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驱动来自于外源和内生动力驱动的合力作用

事物的发展，总是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是促成变化的条件，内外因结合才能真正推动事物的发展。如果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只偏重于接受物质上的被动式扶贫，而对扶志、扶智、扶技的动力能力扶贫接受较少，贫困人口脱贫的意愿没有被唤醒、动力没有被激发，本该由外源和内生动力合力驱动的脱贫实践只依靠外源独立驱动，势必在发展方向和可持续性上出现巨大偏差，无法实现脱贫行动的根本目标。云南 11 个“直过民族”整族脱贫实践的过程中，外源驱动是脱贫的关键和核心，族群内部的内生动力驱动是脱贫的根本和基础，两者所形成的合力正是引领云南“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摘下贫穷的帽子、走上勤劳致富的社会主义发展大道的强劲驱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7 月 20 日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强调：“用好外力、激发内力是必须把握好的一对重要关系。对贫困地区来说，外力帮扶非常重要，但如果自身不努力、不作为，即使外力帮扶再大，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只有用好外力、激发内力，才能形成合力。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只要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激发出走出贫困的志向和内生动力，以更加振奋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就能凝聚起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力量。”^④云南“直

过民族”的整族脱贫实践充分证实了习总书记的这一科学论断，坚持“用好帮扶外力、激活内生动力、汇聚各方合力”，以各民族群众为主体，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群众脱贫攻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着力“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实现既富口袋、又富脑袋，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在外力帮扶、外部输血的强力驱动下，摒弃“等、靠、要”和消极思想，培育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意识，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斗志，增强自我脱贫、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靠双手、靠劳动拔除穷根、消除贫困，开启幸福小康的征程。

（二）“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驱动将在乡村振兴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云南“直过民族”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实现整族脱贫，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后，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这一新的征程中，“直过民族”用好外源合力帮扶的驱动力、激活民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凝聚八方合力的整族脱贫实践也必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有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的发展不仅要建立防返固脱机制，更要围绕乡村振兴20字方针在目标导向、体制机制上一以贯之，破解民族聚居区在党的组织建设、基层治理能力、特色产业发展、人才智力支持等方面的发展难题。通过实施动态监测，强化基层党组织力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育扶持力度，建立民族地区现代治理体系，实现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国家富强的“三结合、三推进”。

通过外源驱动汇聚力，内生动力激活恒力，实现了“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群众从“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从“赤贫如洗”到“安乐富足”两个转变，打造群众生活有保障、发展有支撑、管理有秩序、建设有动力的民族新村寨，探索出了一条适宜边疆民族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释：

1 斯大林：《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24-33页。

2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民族“直过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资料汇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8页。

3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民族“直过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资料汇编》，第8页。

4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民族“直过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资料汇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8页。

5 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关于边疆农业生产合作化、农业生产及少数民族扫盲规划》，1956年1月25日，云南档案2-1-1826卷。

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8页。

7 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4页。

8 张帆、杨文明：《云南独龙族等9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族脱贫》，《人民日报》2020年3月20日。

9 人民网：《汪洋在云南调研“直过民族”扶贫工作李纪恒陪同》，<http://leaders.people.com.cn/n1/2016/0105/c58278-28013621.html>.

10 中国社会科学网：《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的里程碑意义》，http://www.cssn.cn/skyskl/skyskl_yzfc/202004/t20200407_5110270.shtml?COLLCC=771168633&.

11 人民网：《人民日报评论员：坚持人民至上——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0/0602/c1003-31731661.html>.

12 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0页。

13 光明网：《脱贫致富贵在立志》，http://news.gmw.cn/2017-04/09/content_24160691.htm.

14 人民网：《脱贫攻坚必须坚持“富脑袋”和“富口袋”并重》，<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n1/2020/0321/c1001-31642381.html>.

15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习近平谈摆脱贫困：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8/1009/c385476-30329647.html>.